

“主义”的纠结与纠缠：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内涵及关系论辨

The Intertwining and Entangling of “-isms”: Debate on the Connotations and Relations of Realism and Naturalism

蒋承勇 (Jiang Chengyong)

内容摘要：由亚里士多德“摹仿说”所奠定的“写实”传统，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之前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导传统，被后来的西方文学史家称之为“摹仿现实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古已有之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于19世纪格外盛行，人们将它视为一种“文学思潮”，而实际上它只是以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为思想核心，经由西方叙事文学传统逐步锤炼的“摹仿现实主义”的新形态，依然属于一种创作倾向而非文学思潮。由于自然主义也强调“写实”与“真实”，因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表述中，它总是与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或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极端化”，或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或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堕落”。事实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迥然有别。自然主义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主张经由“体验”这个载体让生活本身“进入”文本，而不是接受观念的统摄以文本“再现”生活，从而达成了对传统“摹仿/再现”式“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改造。因此，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是一种有自己“新质”、不同于传统“摹仿现实主义”和作为创作倾向的“现实主义”的现代文学形态。

关键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摹仿说；文学思潮；创作倾向

作者简介：蒋承勇，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Intertwining and Entangling of “-isms”: Debate on the Connotations and Relations of Realism and Naturalism

Abstract: The “realistic”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mimesis” of Aristotle had always been the dominant literary tradition before Romanticism in literature in 19th century and was called “mimetic Realism” by later western literary historians. Affected by scientific thoughts, this “realistic” tendency which had long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became extraordinarily prevalent and was regarded as a “literary trend”. However, it is a new form of “mimetic Realism” gradually forged by 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s with ancient Greek rationalism philosophy as its theoretical core. Hence it is still an inclination of creative writing rather than a literary trend. Because Naturalism also emphasizes “realistic writing” and “reality,” it has always been “bound” together with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expressions on literature. It is either called “extreme Realism,” “development of Realism,” or “fall of Realism.” In fact,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Naturalism and Realism are totally different. With emphasis on the directness and intensity of “experience,” Naturalism allows life itself to “enter” texts via the vehicl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represent” life with texts controlled by ideas, and attains a revolutionary reform of traditional “mimetic/representational” Realism. Therefore, the literary trend of Naturalism is a modern literary form of Realism as an inclination of creative writing which has its own “new qualities” and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mimetic Realism.”

Key words: Realism; Naturalism; mimesis; literary trend; inclination of creative writing

Author: Jiang Chengyong, Ph.D. in literature and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fields of interests are mainl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Email: jcy@zjgsu.edu.cn).

19 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其影响之广泛、深远和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在我国学界却一直来纠缠不清，众说纷纭。五四前后，19 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时，受日本译界的影响，我国学界也把它与自然主义文学融混在一起被翻译成为“写实主义”；后来，又由于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褒扬现实主义而贬抑自然主义，我国学界一直将现实主义看成是 19 世纪西方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文学思潮，而把自然主义看成现实主义的延续，并且，评判自然主义作家的成就要看其创作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因此，现实主义也就成了衡量自然主义文学之成就的价值尺度和艺术标准。作为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19 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到底应该被视为一个具体的文学思潮，还是一种应时而生的文学创作倾向？它和自然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辨析与破解的学术纠结。

一、作为“创作倾向”的现实主义

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是最能代表“现实主义”之内在含义的作家，但他

与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一词来表明自己创作的流派归属。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一文中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个概念在文学领域最早的一次运用是1826年，但其流行却与19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法国画家库尔贝与小说家尚弗勒利的积极应用有关。19世纪中后期，在整个西方文坛，的确曾两度出现过松散的以“现实主义”命名的文学社团，且都是在自然主义的故乡法国。第一个“现实主义”松散组织大致存在于1855年至1857年，主要参加者是尚弗勒利和杜朗蒂，他们在1856年11月至1857年5月曾创办过一本题名为“现实主义”的杂志；1857年，尚弗勒利里还将自己的一个文集冠名《现实主义》印行。第二个松散的“现实主义”社团出现于七十年代末，成员是两个在文学史上根本找不到名字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均为左拉的崇拜者；他俩在1879年4月至6月也曾创办过一份题名为“现实主义”的杂志。这两个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组织，均因创办者的寂寂无名、存在时间的昙花一现以及影响力的低微，未曾进入一般文学史家的视阈。而且，后者作为渐趋高潮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一般文学青年中的反响，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前者，从能看到的尚弗勒利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表述来看，其基本的文学主张与稍后出现的自然主义基本一致，因而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前奏。总之，这两个曾经以“现实主义”命名的文学组织，都不足以成为文学思潮的重要标准，也与中国学界所理解的“19世纪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相去甚远。

作为文学史对某个时代文学—诗学特质进行整体描述的概念，“文学思潮”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在新的哲学文化观念——尤其是其中人学观念的引导下，通过文学运动（社团/期刊/论争）的形式，创立新的诗学观念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新的文学方法，从而最终创造出新的文学文本形态。

一种文学思潮的独立存在，既要有特定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更要形成具有特定诗学观念和艺术品格的“精神气质”，它是文学思潮得以确立的本质要素。通常，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可以超越历史，但“精神气质”必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意味着文学思潮的概念不但有内涵上的“质性”规定，也有外延上的“历史性”或“时期性”刻度。就此而言，与在西方持续2000多年的“摹仿说”（后人又成其为“再现说”）相辅相成因而几乎“无边的”现实主义，就不是一个思潮的概念，而是一种与“摹仿”观念及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相关涉的“创作倾向”。由亚里士多德“摹仿说”所奠定的“写实”传统，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之前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主导传统，后来西方文学史家称之为“摹仿现实主义”。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衰微、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之际，徜徉于滋养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大潮，愤懑于浪漫主义走向极端后的虚无浮泛，这种古已有之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格外盛行，人们误将它视为一种“文学思潮”，而实际上它只是以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

学传统为思想核心，经由西方叙事文学传统的逐步锤炼的“摹仿现实主义”的新形态，它依然属于一种创作倾向而非文学思潮。

大致说来，19世纪中叶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小说家，将浪漫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元素和文学元素进行了简单融合，在对自身依然置身其中的浪漫主义隐隐约约的抱怨声中，由这种“融合”而成的文学创作给文坛带来一种新气象。不过，虽然其间已经透露出了未来文学和诗学形态的不少信息，但这些信息只是“信息”而已，其“新质”未尝凝结为足以相对完整、独立的诗学系统、方法论系统和文本构成系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新潮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的时候依然如此。而且，除了上述提及的19世纪中后叶出现于法国的两个名实不尽相副的“现实主义”松散组织之外，我们至今也无法在19世纪的西方文坛上寻觅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社团/期刊/论争）的踪影，这一历史事实也再次表明：19世纪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实体性的文学思潮，而是一种创作倾向。

正是作为“创作倾向”的概念，现实主义因其“外延”的“无边”，其“内涵”常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实际存在中，因其内涵的这种游弋不定与外延的无限膨胀，现实主义常常本能地趋向于寻求某种外在的支撑，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组合”。在西方，有后来的“心理现实主义”“虚拟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反讽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朴素现实主义”、“传奇现实主义”、“乐观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一而足。在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一人就曾用过“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英雄现实主义”和“宏伟现实主义”等多种术语，此外还有沃隆斯基的“新现实主义”、波隆斯基的“浪漫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的“倾向现实主义”、阿·托尔斯泰的“宏伟现实主义”、列日涅夫的“辩证现实主义”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高尔基的“批判现实主义”和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正式写进作家协会章程并规定为苏联文学基本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热烈讨论并一度被确定为中国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变种“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外，相应的还有“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周扬）、“进步的现实主义”（周扬）等。“现实主义”的这种惊人的繁殖力，其表征的正是其作为文学传统的创作倾向属性，而非文学思潮。

19世纪中叶，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确实创造出了若干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构成了“现实主义”勃兴的繁荣局面，“巴尔扎克通过给新兴城市和初期的资本主义动力以及猖獗的个人崇拜赋予形式，‘发明了’十九世纪”（Brooks 22）。他们的艺术成就不容置疑；但他们的艺术成就却不应该简单地归诸于其反对浪漫主义或复归作为西方文学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事实上，已然处在现代文学区段上的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明显不

同于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管是从文学观念还是从创作风格上来说，都完全无法用“摹仿现实主义”的尺子来度量：他们身上既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因此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才将他们视为浪漫主义者；又有不同于一般浪漫主义而属于后来自然主义的诸多文学元素——后来自然主义文学领袖左拉才将他们称为“自然主义的奠基人”。正是基于此种状况，有文学史家干脆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唤作“浪漫写实主义”；这种“浪漫写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现实主义”，虽在“写实”的层面上承袭了旧的“摹仿现实主义”，但同时却也在更多的层面上以其“现代性”构成了对“摹仿现实主义”传统的改造与发展。

艺术活动毕竟是最张扬个性的人类活动；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创作，都绝无可能用一个什么“主义”的术语或标签盖棺论定。文学史研究应把思潮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区别开来；文学思潮层面的宏观研究不能代替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反之亦然。将一个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装到一个套子里发放统一“牌照”，简单倒是简单，但这可能已经不是在偷懒，而有可能是在糟蹋文学。在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与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研究的关系上，也许左拉的话足资借鉴：“一个学派就意味着对人的创造自由的一种否定”，“每个流派都有过分之处，以致使自然按照某些规则变得不真实”，“流派从来不会产生一个伟人”（《左拉文学书简》249）。

基于此，我们再来审视19世纪中叶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成就，答案变得更为坚实可信。抛却作家本人的天才与个性不论——这对作家的创作成就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内在原因，19世纪中叶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繁荣局面的形成，从外在原因来考察，至少有如下因素值得认真评估：其一，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所带来的对传统的文学成规的冲击，为这一代作家释放创作潜能提供了契机；其二，现代社会这个庞然大物的形成，开启了“上帝之死”的文化进程，一个动荡不安的多元文化语境对19世纪中叶西方文学创作的繁荣当然是一个福音；其三，工业革命加速推进所积累起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在19世纪中叶既然能够催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流行，对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当然也会释放出巨大的召唤效应；其四，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人的鼓舞，科学精神对社会科学渗透，催发了作家通过文学创作“研究”、“分析”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浓厚兴趣，强化了文学创作的“写实”与“再现”理念。以上种种因素，都催发了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发扬光大，助推了19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表述中，自然主义始终是与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极端化”，或者说它是“现实

主义的发展”，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堕落”，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如果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文献稍加检索，人们很容易便可发现当时左拉们也是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捆绑”在一起来使用的。通常的情形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作为同位语“并置”使用，例如，在爱德蒙·德·龚古尔写于1879年的《〈臧加诺兄弟〉序》中，便有“决定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文学上如实研究的胜利的伟大战役，并不在……”（《文学中的自然主义》299）。这样的表述；在另外的情形中，人们则干脆直接用现实主义指称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是举着反对浪漫主义的旗帜而占领文坛的。基于当时文坛的情势与格局，左拉等人在理论领域反对浪漫主义、确立自然主义的斗争，除了从文学外部大力借助当代哲学及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外，还在文学内部从传统文学那里掘取资源来为自己辩护。如上所述，2000多年以来基本始终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传统的是由亚里斯多德“摹仿说”奠基的“写实”传统，西方文学史家常以“摹仿现实主义”名之，在文学史上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弗斯特5）。这正是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术语“捆绑”在一起使用的缘由。这种混用，虽然造成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概念的混乱（估计左拉在当时肯定会为这种“混乱”而感到高兴），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却并非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就此而言，当初左拉们与后来中国学界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两种“捆绑”，显然有共通之处——都是拿现实主义来界定自然主义；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历史的联系也未可知——前者的“捆绑”或许为后者的“捆绑”提供了启发与口实？但这两种“捆绑”显然又有巨大不同：非但历史语境不同，而且价值判断尤其不同。在这两种不同的“捆绑”用法中，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迥然有别。

左拉等人是将自然主义与“摹仿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而我们则是将自然主义与高尔基命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或恩格斯所界定的那种“现实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左拉那里的现实主义是“摹仿现实主义”；作为西方文学传统的代名词，“摹仿现实主义”所指称的是2000多年来西方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笼而统之的“写实”精神，因而是一个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倾向”。作为一种“创作倾向”概念，左拉所说的“现实主义”，其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之大，甚至大致等同于“传统西方文学”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在某些西方批评家那里才有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样的说法。而在中国学人的笔下，“现实主义”非但指称一个具体的文学思潮（认为它是确立于1830年但迄今一直没有给出截止时间的文学主潮），而且是指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由恩格斯所命名的、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进步乃至是“至上”的、显然不同于一般“摹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同于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之基于文学运动的策略选择，中国文学界对自然

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术语的“捆绑”，其出发点有着明显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背景。国人的表述在文学和诗学层面上都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循着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思维逻辑重新人为地设定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内涵与外延。

在主要由左拉提供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中，其将自然主义扩大化、常态化的论述有时候甚至真的到了“无边”的程度：

自然主义会把我们重新带到我们民族戏剧的本原上去。人们在高乃依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中，恰恰可以发现我所需要的对人物心理与行为的连续分析。（Zola 255）

甚至在 18 世纪的时候，在狄德罗和梅西埃那里，自然主义戏剧的基础就已经确凿无疑地被建立起来了。（Zola 210-211）

在我看来，当人类写下第一行文字，自然主义就已经开始存在了……自然主义的根系一直伸展到远古时代，而其血脉则一直流淌在既往的一连串时代之中。（Zola 198-199）

这从侧面再次表明，左拉用作为“创作倾向”的现实主义来指称自然主义只是出于一种“运动”的策略，并非表明自然主义真的等同于作为“创作倾向”的现实主义。否则，我们就只好也将他所提到的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都当成是自然主义了。正如人们常常因为自然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攻击，而忽略其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人们也常常甚至更常常因为自然主义对“摹仿现实主义”的攀附，而混淆其与“摹仿现实主义”的本质区别。其实，新文学在选择以“运动”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文坛地位的时候，不管“攻击”还是“攀附”，这都只不过是行动的策略，而根本目的则只是为了获得自身新质的确立。事实上，在反对古典主义的斗争中，浪漫主义也曾返身向西方的文学传统寻求支援，我们是否由此也可以得出浪漫主义等同于“摹仿现实主义”的结论呢？显然不能，因为浪漫主义已经在对古典主义的革命反叛中确立了自己的“新质”。虽然为了给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确凿的辩护曾将自然主义的外延拓展得非常宽阔，但在要害关键处，左拉与龚古尔兄弟等人都不忘强调：“自然主义形式的成功，其实并不在于模仿前人的文学手法，而在于将本世纪的科学方法运用在一切题材中”（《文学中的自然主义》251）。“本世纪的文学推进力非自然主义莫属。当下，这股力量正日益强大，犹如汹涌的大潮席卷一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小说和戏剧更是首当其冲，几被连根拔起”（Zola 219）。这种表述无疑是在告诉人们，自然主义是一种有了自己“新质”的、不同于“摹仿现实主义”的现代文学形态——作为“创作倾向”的西方 19 世纪现实主义。

“写实”乃是西方文学的悠久传统，但这一传统却并非一块晶莹剔透的

模板。德国文学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在他著名的《摹仿论——西方文学所描绘的现实》一书中，通过对以《荷马史诗》为端点的希腊古典叙事传统与以《圣经》为端点的希伯来叙事传统稍加考察比较后发现：所谓“写实”的西方文学传统，原来在其形成之初便有着不同的叙事形态。不管是在理论观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西方文学中的所谓“写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的（3-23）。具体来说，这不但涉及到不同时代，人们对“写实”之“实”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相应地对“写实”之“写”的如何措置也总有着迥异的诉求。就前者而言，所谓的“实”是指什么？——是亚里斯多德之“实存”意义上的生活现实？还是柏拉图之“理式”意义上的本质真实？又抑或是苏格拉底之“自然”意义上的精神现实？这在古代希腊就是一个争讼不一的问题。《诗学》之后，亚里斯多德“实存”意义上的“现实说”虽然逐渐成为长时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但究竟是怎样的“实存”又到底是谁家的“现实”却依然还是难以定论；——是客观的、对象性的现实？还是主、客体融会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现实？又抑或是主观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在用那种体现着写实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为新兴的自然主义张目的时候，左拉显然是意识到了如上的那一堆问题；所以，在将自然主义的本原追溯到远古的“第一行文字”的同时，左拉又说：“在当下，我承认荷马是一位自然主义的诗人；但毫无疑问，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已远不是他那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毕竟，当今的时代与荷马所处的时代相隔实在是过于遥远了。拒绝承认这一点，意味着一下子抹掉历史，意味着对人类精神持续的发展进化视而不见，只能导致绝对论”（Zola 198）。

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实证主义美学家泰纳认为，艺术家“要以他特有的方法认识现实。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感到必须照他理解的那样去描绘事物”（《文学中的自然主义》68）。由此，他反对那种直接照搬生活的、摄影式的“再现”，反对将艺术与对生活的“反映”相提并论。他一再声称刻板的“摹仿”绝不是艺术的目的，因为一个浇铸物品虽可以制作出精确的形体，但却永远不是雕塑；无论如何惊心动魄的刑事案件的庭审记录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喜剧。泰纳的这种论断，后来在左拉那里形成了一个公式：艺术乃是通过艺术家的气质显现出来的现实。“对当今的自然主义者而言，一部作品永远只是透过某种气质所见出的自然的一角”（Zola 198）。而且左拉认为，要阻断形而上学观念对世界的遮蔽，便只有“悬置”所有既定观念体系，转过头来纵身跃进自然的怀抱，即“把人重新放回到自然中去”（Zola 255），“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778）。由此出发，自然主义作家普遍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主张经由“体验”这个载体让生活本身“进入”文本，而不是接受观念的统摄以文本“再现”生活，达成了对传统“摹仿/再现”式“现实主义”的革命性

改造。即便不去考究在文学－文化领域各种纷繁的语言学、叙事学理论的不断翻新，仅仅凭靠对具体文学文本征象的揣摩，人们也很容易发现西方现代叙事模式转换的大致轮廓。例如，就“叙事”的题材对象而言，从既往偏重宏大的社会－历史生活转向偏重琐细的个体－心理状态；就叙事的结构形态而言，从既往倚重线性历史时间转向侧重瞬时心理空间；就叙事的目的取向而言，从既往旨在传播真理揭示本质转向希冀呈现现象探求真相；就作者展开叙事的视角而言，从既往主要诉诸“类主体”的全知全能转向主要诉诸“个体主体”的有限观感；就作者叙事过程中的立场姿态而言，从既往“确信”、“确定”的主观介入转向“或然”、“或许”的客观中立……

种种事实表明，如果依然用过去那种要么“再现”要么“表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面对已然变化了的西方现代文学，依然用既往那种僵化、静止的“写实”理念来阐释已然变化了的西方现代叙事文本，人们势必很难理喻自己所面对的新的文学对象，从而陷入左拉所说的那种“绝对论”。而如果将这种“依然”顽固地坚持成为偏执，那人们就只会非常遗憾地看到一幅非常滑稽、悲惨的情景：因冥顽不灵而神色干瘦枯槁的中国现代文士们，穿着堂·吉珂德式的过时甲冑，大战包括自然主义文学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这部充满活力与动感的壮丽风车。

【 Works Cited 】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P, 2003.
- Brooks, Peter. *Realist Vis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2005.
- 柳鸣九编：《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 [Liu, Mingjiu, ed. *A Selection of French Naturalist Work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利里安·R·弗斯特等：《自然主义》。任庆平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
- [Furst, Lilian R. *Naturalism*. Trans. Ren Qiping. Beijing: Kunlun Press, 1989.]
- 朱雯等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 [Zhu, Wen, et al eds. *Naturalism in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2.]
- 《左拉文学书简》。吴岳添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 [Zola, Emile. *Zola's Literary Letters*. Trans. Wu Yuetian.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5.]
- Zola, Emile. "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 *Docu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Realism*. Ed. George J. Becke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63.

责任编辑：张连桥